

从拉美电影月看中国社会对拉美文化的关注

拉美电影是世界电影之林的一枝奇葩，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它注重打造植根于本土文化的电影风格，大胆融合魔幻现实主义，以充满想象力的电影语言对现实生活进行辛辣讽刺和鞭挞；它既能鲜活地展现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又能于细微处流露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当好莱坞商业片在电影市场大行其道时，拉美电影在国际电影节接连获奖，吸引世界影人的广泛关注。2009年7月，北京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举办以“被切开的血管——拉美映像”为主题的拉美电影月，撷取4部经典影片：智利的《马丘卡》(Machuca)、阿根廷的《掠夺的记忆》(Memoria del saqueo)和《旅行》(El Viaje)以及墨西哥的《小提琴革命曲》(El Violín)，邀请一批中国知名学者和专家就影片内容进行评论，并与观众进行互动讨论。

一 影片围绕阶级、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运动三大主题

《马丘卡》是一部以阶级调和解决阶级矛盾理想的幻灭的影片。影片依托圣地亚哥的一所贵族学校展开故事内容。校长马克安诺是一位坚持解放神学思想、致力于消弭阶级隔阂的左派神父，执意招收当地附近贫民窟的小孩入学，来自贫民窟的马丘卡与来自中产阶级的贡萨洛由此成为好友。此时正值1973年，以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人民团结阵线”已执政3年。在此期间，阿连德政府推行的温和社会变革遭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报复。在左右两翼的尖锐对立中，中产阶级倒向右翼，与贫民窟出身的左翼分子各据一方。9月11日，得到美国支持的右翼发动军事政变，智利历史就此改写，片中两位主人公的友谊在巨大的政治鸿沟面前破裂。

《旅行》和《掠夺的记忆》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控诉与抨击。这两部影片的导演是以倡导独立于欧美电影、以电影为武器反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第三电影”而闻名世界的阿根廷电影大师费尔南德斯·皮诺·索拉纳斯。他曾担任国会议员和参加总统选举，对阿根廷的政治状况有着深刻的

洞察。他的影片往往以匪夷所思的艺术手法展现深奥的政治和社会寓意。

《旅行》以梅内姆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苦难后果为叙事背景。主人公马丁为了寻找父亲，从阿根廷火地岛北上到墨西哥瓦哈卡，沿途发现这块大陆被外债高筑、政治腐败和生态破坏吞噬的破败不堪。为马丁引路的是几位虚构的人物以及连环画中的人物。这些人物记录着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至1992年500年的历史，见证了殖民主义者和本国政府的暴行。

《掠夺的记忆》采用纪录片形式，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以及专家的深刻分析拍摄而成，堪称一份对新自由主义的泣血“控诉状”。影片分为10个章节，深刻揭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和巨大破坏力。第一、第二部分为“无限的债务”。它追溯到1824年阿根廷与英国巴林兄弟银行签订的第一份贷款合同。从那时起，外债就与各种商业行为和政府贿赂腐败联系在一起。独裁统治在1983年结束后，历届阿根廷政府的背信弃义便构成了一部“叛国编年史”。中间六部分是指随着反对党、议会、法院的失效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共和国堕落”了；政府实施了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大规模实行能源“私有化”，“拍卖石油”等国家资源；由于正义党和激进党的“社团化和媾和”，梅内姆得以连任总统，整个国家处于“黑手党政治”之下。这就是政府、外国财团和国际金融机构共同掠夺阿根廷的过程。最后两部分的重点是讲掠夺造成的后果。“社会大屠杀”作为一种隐形暴力，带来了失业、饥饿、贫穷和社会保障的丧失，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在70年代的政治恐怖和马岛战争时的死亡人数。2001年12月20日，愤怒的人们涌上街头向政府抗议，德拉鲁阿总统的辞职则象征着新自由主义和腐败政府的“末日之始”。

《小提琴革命曲》依托农民起义，对拉美人民反抗社会不公正的社会运动进行诠释。影片主人公、独臂老人布鲁塔戈与儿孙平日在街头卖艺谋生，同时暗中为游击队工作。农民起义发动在即，

李菡
从拉美电影月看中国社会对拉美文化的关注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埋藏军火弹药的村庄却被政府军占领。布鲁塔戈只身前往军营，通过演奏音乐获得军官的信任。然而，当老人试图把取出的军火交给游击队时，事端败露，“喜爱”音乐的军官毫不犹豫地把枪口对准了老人。

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踏上美洲大陆之日到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从未放弃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斗争内容从昔日的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转变为现在的推动土地改革和改善自身生存状况。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农民组织。影片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这些独立的农民组织其实正是现今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先驱。

二 影片的独特风格强烈地吸引中国观众

《旅行》表现的浓厚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令中国观众耳目一新。影片在各种荒诞、幽默、夸张并极具讽刺意义的超现实主义画面中包含着一系列的政治隐喻。如被洪水淹没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穿着脚蹼的“蛤蟆”总统暗指政客们在整个国家已被外债洗劫一空时依然活得自在；在“下跪国家联盟”大会上，“蛤蟆”总统在美国“豺狼”总统面前说道：“下跪是最恰当的姿态，站起来会有被子弹射中的危险，躺下则会被人当作死人。”“跪下的人成为历史，站着的人成为传说。”所有这些充满讽刺的比喻和象征是对依附理论的最佳诠释，也是对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有力鞭挞。《掠夺的记忆》有大量极具反差的对比镜头。在城市里高耸的摩天大楼下，穷人正在为寻找一口食物而拼命挣扎——这种“残酷的真实”鲜明而强烈地冲击着现场观众的视觉与心灵。

拉美电影对阶级的讨论引起中国观众的回应。有些观众认为《马丘卡》所反映的超阶级友谊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温和改良之路也是走不通的。实现和谐并最终道路必然是两个对立阶级之中的一个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提出，20世纪法属马提尼克思想家、作家、心理分析学家弗朗茨·法农所说的暴力革命是解决阶级问题的唯一途径吗？此外，人们是否还有另一种选择？她以《枣红马的故事》为比喻，希望大家求索另一个世界，寻找不同的逻辑与可能。在这个故事中，枣红马或被杀，成为主人的果腹之物，却仍难使主人摆脱冻饿而死的噩运；或揭竿而起，闯出一条活路。于是，在影片主人公杜里托口中，“枣红马可不想等到故

事结尾，它逃走了，跑进了另一个故事”。“没有‘后来’了。你只能到另一个故事里去寻找枣红马了”。寻找枣红马，便是寻找另一个故事，创造另一个世界，而这要求充分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观众对《马丘卡》影片中马克安诺神父的历史真实性提出疑问。戴锦华指出，这个电影人物是完全依托当时拉美社会的原型人物塑造而成。在20世纪60年代，伴随解放神学在拉美兴起，一批倡导平等、关爱穷人的左翼神学人士涌现，主张通过积极的方式消除社会弊病、实现社会的和解。对于任何一个存在弱势群体、渴望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马克安诺神父这样的人物都会拥有巨大的魅力。他无疑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希冀和信念。

拉美人民在苦难中反思和抗争的传统以及那种永不言败的精神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小提琴革命曲》刻画的农民运动，《掠夺的记忆》展现的“五月广场母亲”运动和失业者组成的“拦路者”运动，都是弱势群体为争取真正民主发起的社会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排他体制的抵抗斗争急速发展，在拉美地区掀起了社会运动的新高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指出，索拉纳斯导演以其多年深入社会斗争现场具备的敏锐洞察力，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获取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就《掠夺的记忆》涉及的军事政变和阿根廷危机，现场专家与观众围绕阿根廷石油私有化状况、政党制度、社会运动、拉美的土著以及游击队问题进行对话。

中国观众关注拉美影片传达的拉美人对自我历史的审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和对自我灵魂的寻找。拉美国家和中国都曾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之害，当前都在积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因此，如何看待殖民主义历史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道路和文化前途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影片《旅行》的主人公从美洲大陆南端的火地岛北上，历经坎坷，最终在墨西哥找到父亲。此时，父亲的卡车正运载着阿兹特克羽蛇神像。神像寓意印第安文明才是拉美人民的民族身份的源头。倘若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自我，就没有文化的身份，因而必然在全球化的时代丧失发展前途。

此次电影月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民众对拉美日渐浓厚的兴趣。拉美电影为中国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拉美的窗口，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

(李菡 供稿)